

《凝脂手》： 一双手里的民间史

■文/饶曙光 茹纪晓

胡玫导演的《凝脂手》，是一部从寻常生活中寻找力量的用心之作。从一门再普通不过的手艺出发，讲述了一个普通女性在漫长岁月中凭借劳动改变生活、走出自己人生道路的故事。

《凝脂手》这个片名很有意思。“凝脂”让人想到豆腐洁白、细腻、温润的质地；“手”则指向了将黄豆变成豆腐的人。电影并没有把“手”处理成一个被反复强调的视觉符号，真正赋予“手”意义的是贯穿人物一生的劳动过程。从造豆、磨浆到点卤、压制，一方豆腐从原料到成品的过程，被清楚、细致而又富有美感地呈现在银幕上，主人公潘豆妮的人生也随着这门手艺一步步展开。一双手先学会一门手艺，再靠手艺撑起生活，最后又在漫长岁月中留下属于自己的时代印记。影片所呈现的，正是一部从普通人的双手里生长出来的民间史。

一方豆腐里的劳作岁月

豆腐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食物。正因为太熟悉，我们往往只把它当作日常生活中寻常的一部分，很少去留意这一方洁白柔软的食物背后连接着怎样的生活。《凝脂手》以一方豆腐为切口，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讲述潘豆妮在现实磨砺中依靠劳动撑起人生、不断向前的事迹。对于潘豆妮而言，豆腐伴随着她的成长，也连接着家庭、生计和人生选择；对于影片而言，一方豆腐则成为观察普通劳动者生活的一扇窗口。它从餐桌上的寻常之物，逐渐延伸为人物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由此，电影对豆腐的呈现具有了超出食物本身的意义。

黄豆经过浸泡、研磨、加热、点卤和压制，质地不断发生变化，整个过程既有动作，也有等待。影片把这些环节组织成富有节奏的影像过程：豆浆缓缓流动，水汽不断升腾，灶火明明灭灭，白色豆腐逐渐凝结成形，人物的身体则始终与石磨、纱布、木器和浆液保持着紧密联系。尤其是做豆腐的段落，画面常常带着一种清润、温暖的美感。豆浆从器皿间流下，水汽在光线里散开，洁白的豆腐从混沌的浆液中一点点显出形状，劳动过程由此拥有了一种近乎仪式感的美。

这种意象化的处理并没有让劳动变得虚浮。恰恰相反，正因为影片以真实而富有美感的方式呈现这些劳动细节，劳动才在银幕上显得鲜活而有分量。做豆腐有工序，更讲究分寸。点卤、火候、力道与时机彼此牵连，真正的手艺往往就藏在这些难以量化的细微判断中，并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慢慢沉淀为经验。所谓“手艺”，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与分寸，最终沉淀为身体的记忆。

因此，《凝脂手》拍的不只是豆腐，更是在拍劳动如何成为人的能力。一双手在一次次重复中变得熟练，一门手艺也在岁月中逐渐成为人物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一部表现普通劳动者的电影来说，这种处理尤其重要。它让劳动本身成为值得观看、值得尊重的内容。一方豆腐背后，是漫长的时间，是身体的记忆，也是一个普通人和生活建立联系的最直接方式。

一门手艺撑起的人生

当“手艺”从劳动过程进入人物命运，它的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对于潘豆妮来说，学会做豆腐最初意味着一种谋生能力。它不是抽象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后来才被赋予价值的非遗符号，而是一个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依靠的本事。父亲意外离世后，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潘豆妮放弃了继续读高中的机会，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哥哥，自己则留在家中学做豆腐、承担生活。这个决定改变了她此后的人生方向。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继续读书原本意味着另一种可能，而家庭现实最终让她更早进入了生活。这个选择背后有亲情的牵绊，也有那个年代普通家庭面对有条件时的现实取舍与无奈。

在这样的处境中，一门手艺开始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会做豆腐，意味着她拥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能力，虽不能立刻改变命运，却能够使一个人在面对困境时多一分依靠。黄豆、磨盘、灶台和卤水看起来都很普通，但当这些东西通过劳动转化为可以养活一家人的食物时，手艺也就成为生活中最可靠的一部分。《凝脂手》对潘豆妮人生的处理，更强调岁月积累下来的变化。她在经年劳作与现实磨砺中逐渐站稳脚跟，从维持生计、承担家庭，到拥有更多生活选择，人生的道路也随之一步步打开。这样的变化看起来不够传奇，

却更接近大多数普通人的人生。

主人公潘豆妮在这一过程中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经济条件的改善。随着生活经验不断增加，她面对现实的能力也在变化。她开始拥有自己的判断，可以在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环境中寻找出路，也逐渐拥有对自己人生更多的决定权，这正是“一门手艺撑起的人生”的意义。“撑起”包含承担，也包含坚持。手艺让潘豆妮可以供养家庭，可以度过困难，可以寻找新的生活机会，也使她不必始终等待别人替自己安排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做豆腐不仅是谋生手段，也在经年累月的劳动中塑造着人物。

影片将女性力量融入日常生活的真实肌理之中。潘豆妮在家庭责任与现实磨砺中逐渐确立自己的生活选择，显现出普通女性坚韧而持久的生命力量。她依旧会经历困境，也会遭遇人生的无奈，但她已经拥有了依靠自己的能力。这份力量，最终凝聚在那双不断劳作的手上。最初，这双手只是学习怎样把豆腐做好，后来它开始支撑一个家庭，也逐渐托住一个人的人生。一方豆腐因此连接起了更多东西。它连接着生计，也连接着亲情、责任和选择。一门看似普通的手艺，最终撑起了这个普通女性的人生道路。

一个普通人的时代印记

《凝脂手》的故事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延伸至新时代，跨越数十年的社会变迁。潘豆妮的人生也在这条时间线上逐步展开：年轻时，她靠双手学会做豆腐、承担家庭责任；此后，又带着这门手艺走出故乡，在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中谋求生计、建立自己的生活。几十年过去，这双手留下的已经不只是劳动的痕迹，也记录着一个普通人从乡土生活走向更广阔社会空间的人生轨迹。影片由此把潘豆妮的个人经历放进时代发展的进程之中，也让数十年的社会变迁最终落在一双普通劳动者的手上。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时代往往就体现在谋生方式、生活环境与人生选择的变化之中。潘豆妮的人生经历恰好把这些变化串联起来。豆腐原本是维系一家人生计的手艺，随着人的流动，它被带出故乡，也进入新的生活环境。随着潘豆妮走出故乡，这门原本用于谋生的手艺也逐渐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凝脂手》所表现的时代变化有着鲜明的生活尺度。它落在一个普通人的去留之间，也落在一门手艺不断变化的生存方式之中。故乡与城市、家庭与社会、谋生与发展，这些关系随着时间慢慢展开。潘豆妮的一生由许多具体选择组成，而正是这些具体选择，让我们触碰到几十年社会变化最真实的一面。时代的前行，最终都会在普通人的生活中留下清晰的印记。

片名中的“手”，也因此有了时间的意味。几十年间，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和人生道路不断发生变化，真正沉淀下来的，是长期劳动形成的经验与能力。年轻时学会一门手艺，后来凭借手艺谋生、承担家庭，再到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潘豆妮的人生也在这样的积累中不断向前。时间由此不再只是岁月的流逝，而具体地留在手艺的熟练、生活经验的增长以及人生选择的变化之中。

所谓“民间史”，正是在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中显现时代的变化。离乡谋生、家庭选择、手艺传承，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经验，都记录着社会发展在普通人身上留下的痕迹。潘豆妮几十年的人生由此有了超出个人经历的意义，她所走过的道路，也映照着一代普通劳动者共同经历的生活变迁。正是在这样的普通人生中，《凝脂手》所呈现的民间史有了真实而具体的生活落点。

总之，《凝脂手》从一方豆腐、一门手艺和一个普通女性的人生出发，以细腻而朴实的影像呈现普通劳动者几十年的生活历程。豆腐让劳动变得可见，手艺让人物得以安身立命，而经年累月的生活又让一双劳作的手逐渐连接起家庭、人生与时代。胡玫导演把宏大的社会变迁落实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之中，使日复一日的劳作、面对困境时的坚持以及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次选择，都获得了属于普通人的分量。从劳动的手，到撑起人生的手，再到留下时代印记的手，《凝脂手》沿着一双手完成了从个体生命到时代记忆的延伸，也由此写下了一部有温度、有质感的民间史。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茹纪晓，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2023 级博士研究生）

经典的创新性发展 银幕的创造性转化 ——评戏曲电影《罗帕记》

■文/尹鸿

从明清开始广泛流传、1950 年代末完成现代改编的《罗帕记》，作为黄梅戏经典大戏，与《天仙配》《女驸马》并称“黄梅戏三绝”。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重排的《罗帕记》，2017 年曾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其舞台演出录像多次在国家级平台展演，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数十次。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梅花奖数字电影拍摄工程支持下，戏曲电影《罗帕记》应运而生。

该片由湖北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湖北长江电影集团联合摄制，多位获得过梅花奖、金鸡奖等全国性戏剧和电影大奖的戏曲艺术家、电影人、戏曲电影专家共同合作、精心打造。《罗帕记》以戏曲电影形式重新呈现给观众，以更加精细准确的视听语言、简洁流畅的叙事节奏、虚实相间的空间场景、情感饱满的镜头调度，在充分保留黄梅戏唱腔的优美、身形的灵动、唱词的生动之外，也更充分地用电影化方式渲染，强化了戏剧的强度和情感的浓度，丰富了经典戏曲的当代性和传播性，扩展了从戏曲观众到电影观众的受众界面，推动了传统戏曲的现代性改编和数字化创新，对于戏曲艺术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戏曲电影《罗帕记》在淡雅、素美的水墨背景下拉开帷幕，展开了具有纵深感和层次感的表演空间，既脱离了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又保持了戏曲美术的舞台性，为戏曲表演的展开营造出假定性基础上更具有立体感的电影调度空间，避免了目前一些戏曲电影在写实性与假定性空间上产生的审美冲突。影片将戏曲的经典名段重现于银幕上，如考前的夫妻送别、劝夫君莫轻信等等段落，都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的戏曲表演风格、节奏和情绪，让观众淋漓尽致地感受到黄梅戏那种重情写人的艺术特色；而其叙事中夹杂的一些配角、

丑角的夸张表演，则大大强化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民间氛围。影片减少了戏曲舞台表演的一些过渡段落以及舞台上人物出场转场的起范、亮相过程，整个电影的叙事更加自然紧凑，镜头对人物的刻画和对观众情绪的引导也更加具有感染力。当陈赛金从嫁妆中拿出传家珍宝金丝九龙罗帕时，反打的近景镜头给了姜雄，贪婪的表情已经暗示了后来剧情的变化；陈赛金从无家可归到幸存于双合镇，汪锦龙从调皮顽童到成长为八府巡按，都是通过电影蒙太奇手段转换完成的，其中少年汪锦龙嘲笑王科举考举不中的段落自然生动，对后来人物命运的变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说，戏曲电影将《罗帕记》跨越 18 年的故事，用电影的方式叙述得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更加丝丝入扣、流畅简洁，在保持黄梅戏固有魅力的同时，也满足了更广大观众的心理期待。

特别值得提到，戏曲电影《罗帕记》采用了更具现代意识的改编版本，它没有将这个故事流于花好月圆、坏人作乱、误会生事、危机化解、苦尽甘来、阖家团圆的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传奇套路，而是浓墨重彩地塑造了陈赛金、店姐陶花容两位女性形象，表现了女性的善良、互助、坚贞和独立。陈赛金的忠贞不通过她对王科举的爱和面对诬告的辩白得到鲜明体现，而在走投无路之后她走上了“自力更生”的生活之路。当儿子汪锦龙长大成人、衣锦还乡，她与王科举之间的误解也终于大白天下之后，陈赛金则选择了对这个无情寡义的男人说“不”。破镜没有重圆的结局既是对女性独立意识的表达，也是对传统戏曲封建糟粕的自觉扬弃。而陶花容泼辣、爽直、勇敢的形象，则将普通劳动妇女那种淳朴、善良、友爱呈现得鲜明生动，民间戏曲中朴素的人民性得以体现。而这两位女性相濡以沫的形象，既为为故事带来了光彩熠熠的

《密档》： 藏在日常烟火里的英雄礼赞

■文/虞晓

片的类型套路，将戏剧冲突从刀光剑影的正面对抗，转移到柴米油盐的日常缝隙之中。传统谍战片高度依赖强情节、强冲突、强反转，密码破译、枪战对峙、卧底博弈是“标配”叙事元素，依靠激烈的戏剧冲突制造紧张感。《密档》中最惊心动魄的戏份，全无硝烟与厮杀。夫妻二人深夜整理机密档案，将密件铺满床面之际，邻居突然贸然闯入，随手拿起关键典籍扇风，一瞬之间，数年潜伏、万千机密濒临倾覆。危机不来自敌人的枪口，而来自一次无心的日常举动；悬念不来自刻意的剧情反转，而来自生活随时可能出现的疏漏与破绽。绝密档案的安危，不系于惊天壮举，而系于每天的一餐一饭、人情往来的应答、每一次邻里寒暄的分寸拿捏。

这种沉浸式的、日常烟火中的悬疑，让每一段日常都暗藏风险，每一次平凡举动都关乎生死，极大提升了叙事密度与情绪张力。与此同时，石库门独特的建筑格局成为天然的叙事装置：轻薄的木隔墙、逼仄的居室、上下错落的楼层，让“隔墙有耳”成为常态，让隐藏与暴露始终处于微妙的平衡，延续了海派电影“一栋弄堂藏尽天下百态”的空间叙事传统。导演郑大圣将影片的创作内核总结为“日常中的反常”，打造出一种“表面风平浪静，内里暗流汹涌”的独特叙事质感。

藏，是要把至大至巨、把革命者的情志隐于日常烟火中。导演没有将镜头只聚焦于主角，而是铺展开一幅完整的乱世众生图景：精明世故却心存良善的房东，勤恳质朴的底层女佣，挣扎求生的市井小贩，漂泊异乡的青年，隐忍度日的普通市民。形形色色的人物穿梭于石库门内外，每个人都在乱世的夹缝中艰难求生，他们有着被现实压榨出的市侩、自私、苟且，也有底层民众未泯的善良与无奈。有人隐忍求生，有人舍身赴义，有人随波逐流，没有绝对的善恶，只有乱世之中真实的人性百态。这也让影片的格局跳出了单一的谍战博弈，从“敌我对抗”升级为“时代与人”的深度描摹。

当然，“藏”不是叙事的目的，是用日常笔触去描画英雄的手段。《密档》摒弃了主旋律创作常见的抒情与拔高，而将革命信仰完全溶解于日常生计之中。一句朴素平实的“人在，箱子在”，便是两位守护者全部的誓言与坚守。石库门里每一次敲门、每一次对视、每

一句闲谈，都是无形的考验。为寻找失散的女儿，沈玉琳不惜触碰纪律红线，甘冒暴露风险，这份超越使命的舐犊情深，反而让英雄更加立体。英雄也有常人一样的情感和诉求，但他们为了使命和信仰，可以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地谨慎与隐忍。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罗帕记”的故事，也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深刻控诉。陈赛金的悲苦命运，一定程度上是长期封建礼教深重压迫下中国女性命运的缩影。实际上，她的不幸遭遇，不仅仅来自于王科举“个人”，故事中甚至也表现了王科举作为“人”的那种犹豫、怜悯，但是来自于礼教的专横、霸道和无情屏蔽、扭曲了王科举的人性。他为了所谓面子、所谓节操、所谓男人的尊严、所谓礼义廉耻的家风，便不由分说、不由辩解、不辨真伪、不问是非，也不顾先前的恩爱和信任，“残忍”地代表“三纲五常”，给陈赛金非走即死、走不如死的绝情选择，这不仅是现代所谓“渣男”的个人品格，更重要的是一种封建男权的无限放大。而恰恰也是这一纸“不贞洁”的所谓休书，也割断了骨肉之情，使陈赛金的父母也不能容地暂且栖身。封建礼教无情的非人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虽然“罗帕记”的传统故事还很难避免“母以子贵”这样的“历史逻辑”，但最晚陈赛金选择对王科举的不原谅、不妥协，“恩怨了结，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则仍然体现了自觉的、鲜明的反封建文化的现代女性意识、现代人格意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戏曲电影《罗帕记》，在故事改编上是对经典戏曲的创新性发展，在电影呈现上则是对经典戏曲的创造性转化。经典借助于现代改编，具有了以人文主义为本的现代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戏曲借助于电影的视听呈现，更加具有大众感染力和传播力。戏曲与电影相互赋能、经典与现代互相对话，为戏曲电影的未来发展、为传统艺术的吐故纳新、为媒融合的美美与共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见过众生相，然后识英雄。鲜活喧闹、充满人间烟火众生百态，成为了革命者最坚固的保护色，也成为他们全力守护的意义。英雄的坚守，正如徐书亭被捕前所说的“更好的世界”，恰恰是要护住这万家灯火、人间寻常，也就是无数普通人可以活成自己、可以安稳度日的平凡权利。

在情节和人设之外，影片的视听语言也展现出了鲜明的作者化自觉。全篇低饱和的泛黄影调，复刻了旧档案的岁月质感，褪去浓艳滤镜，贴合沦陷年代的压抑与沉郁。最具巧思的是彩色日常与黑白审讯的镜头对照：温暖鲜活的市井烟火是主角真实的生活状态，冷峻肃杀的黑白审讯是乱世众生随时可能面临的无妄之灾。两种色调无缝交错、反复穿插，无需台词铺垫，便勾勒出时代个体身不由己的宿命感。影片全程克制配乐，以市井人声、风雨脚步声、细碎动静主导声场，用声音的留白与起伏制造紧张感，搭配多方言的生活化表演、纪实感的镜头抓取，突破了主旋律电影惯常的舞台感与仪式感。

《密档》作为一部形式独特的红色谍战片，也续写了郑大圣电影创作中的作者风格。从《王勃之死》《阿桃》到《村戏》，他所擅长的是在历史缝隙中打捞个体命运，以平视、温柔、冷静的镜头描摹人性与时代。相较于多数主旋律影片聚焦重大历史节点、歌颂英雄壮举，他选择凝视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事件堆砌，而是鲜活的人的故事。同时，影片接续了《乌鸦与麻雀》《马路天使》一脉的海派市井现实主义传统，将红色革命叙事与上海市民电影的人文底色深度融合，让严肃的红色题材拥有了烟火气、人情味与生活化的真实质感。

让观众在平淡日常中，读懂乱世坚守的重量。《密档》对红色谍战片的重写，是一场余音绕梁、让人回味的审美革新，也为红色题材影片探索了新的创作维度。日常即战场，平凡见赤诚，这应该是《密档》留给当代主旋律电影值得借鉴的创新启示。